

陈文新余来明 主编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创新书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985工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创新基地资助



陈文新 余来明 主编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创新书系——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陈文新,余来明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161-0461-3

I. ①明… II. ①陈…②余…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明代②科举制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I206.2②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82232 号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 陈文新 余来明主编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杨 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64073835(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400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 文学与文化总论

“传统”中的“现代性”：中国古代文学中的

- “审父”意识…………… 段江丽(3)
封建专制统治与作家厄运 …………… 吴志达(22)
学术分裂与明代复古文学的“道”论 …………… 张德建(31)

二 明代诗文及其他

- 山岳·士臣·科举 …………… 许东海(67)
唐宋派称名论要 …………… 贝 京(86)
论明代黄文焕《陶诗析义》在陶学史上创新地位…………… 郭伟廷(102)
从《戎旅赋》到《无闷篇》…………… 翁燕珍(118)

三 明代小说与戏曲

- 欲望与诗：明代中篇传奇的题诗唱和与性别表现 …………… 周 艳(141)

- 论“三言二拍”的人物肖像及言语动作描写····· 罗小东(150)
- “杨家将”故事形成史资料考····· 松浦智子(168)
- 解构批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意义
之不确定性····· 周建渝(187)
- 《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一个历史主义或
普遍主义的命题····· 鲁小俊(206)
- 剪裁与编织:由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韵文
运用差异分析小说作者之叙事意识····· 许丽芳(220)
- 从“盗匪”到“救国英雄”····· 王前程(242)
- 论毛氏父子(毛纶、毛宗岗)与金圣叹小说
评点取向之异同····· 黎必信(260)
- 《西游记》中的时代错置、文本互涉及其
英译问题····· 洪 涛(273)
- 论《西游记》的谐趣美····· 朱 玉(294)
- 《隋唐志传》的文体探索及其小说史意义····· 雷 勇(307)
- 胡应麟的小说整理及小说创作····· 陈卫星(323)
- 《杨忠愍蛇胆表忠记》考····· 岩田和子(335)

四 科举文化

- 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 赵伯陶(355)
- 越南科举与儒家典籍之传承····· 王三庆(379)
- 崇禎辛未进士科与吴伟业负恩愧悔心态及其
雅俗文学创作····· 陈书录(394)
- 科举考试对明遗民杜濬及其诗歌之影响····· 徐志平(409)
- 明代科举对徐霞客著述成就的影响····· 曹立波(431)
- 八股文流变之细部考察····· 王 炜(448)
- 论早期试策的史料价值····· 罗积勇 刘 畅(462)

浅谈刘鉴泉对制艺之法的独特见解·····	欧阳楨人(476)
论“博学鸿儒科”对康熙诗坛的影响·····	李舜臣(486)
编后记·····	(505)

文
学
与
文
化
总
论

WENXUE WENHUA ZONGLUN

WENXUE WENHUA ZONGLUN

WENXUE WENHUA ZONGLUN

WENXUE WENHUA ZONGLUN

WENXUE WENHUA ZONGLUN

WENXUE WENHUA ZONGLUN

WENXUE WENHUA ZONGLUN

—

“传统”中的“现代性”：中国 古代文学中的“审父”意识

段江丽

近年来，文学作品中的“审父”、“渎父”、“丑父”乃至“弑父”等等主题是现当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界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相关论著在展开论述之前，或隐或显，大都有一个想当然的逻辑起点，那就是：传统中国是父权制社会，具有“尊父”、“崇父”、“颂父”的文化传统，因此，文学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总是高大、光辉的，中国文学中的“审父”意识是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之下才有的主题。至于具体产生的时间，有的说是二十世纪初期^①，有的说是晚清^②，有的则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③。间或也有学者将中国文学中的“审父”意识追溯至《红楼梦》^④，或者注意到了明清

① 王昕：《解读苏童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

② 余志平、黎翠萍：《张爱玲小说中的“审”父情结》，《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5期。

③ 罗伟文：《先锋小说与“五四”文学的审父意识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季俊峰《张炜小说中的审父主题》，《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

④ 刘红林：《论吕赫若小说中的“审父”意识》，《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文学叙事中存在“审父”主题^①，但是，论述尚不充分。本文就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中的“审父”叙事展开较全面、深入的论述，以便为这一被学界广泛关注的话题提供必要的参考和补充。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从引申和比拟的意义上来说，《西游记》中的唐僧、《水浒传》中的宋江以及《三国演义》中的刘备等等人物都具有“父亲”或者父性“大家长”的原型意义，还有《封神演义》中的哪吒则是彻底反叛的儿子，但是，为了概念的明晰和准确，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严格意义上的家庭伦理中的“父亲”形象，所以，所牵涉的作品主要为古代小说戏曲中的家庭题材作品，以明清小说为主。

本文首先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负面父亲形象进行梳理，然后对这些“父亲”叙事文本中蕴涵的“审父”意识进行分析，最后，再进一步分析否定性审父意识的内在驱动力以及其中蕴涵的“现代性”意义。

一 负面父亲形象类型

传统中国属于典型的以父系血缘为伦理基础的男权社会，按照家国一体、君父一体、忠孝一体的文化设计，在父子伦理之中，父亲处于尊位、主位，子辈处于单位、从位，父亲在子辈面前，拥有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自先秦以来的礼法制度，一直强调“父为子纲”的伦理规范，以强化对父子等级秩序的精神认同。可是，在众多古代戏剧家和小说家笔下，父亲的形象究竟如何呢？

综观元明清戏剧和小说，除了《儿女英雄传》中的安学海等少数几个具有先验性乌托邦色彩的“完美”父亲形象之外，其他众多

^① 杨经建：《论明清文学的叙事母题》，《浙江学刊》2006年第5期。

作品中的“父亲”，尤其是具生活真实感的家庭题材作品中的父亲，大都在性格、能力或道德上具有明显的缺陷，从而成为被怀疑、被讽刺、被批判甚或被全盘否定的可笑、可怜甚至可鄙、可恨的角色。这些负面的父亲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严厉—冷酷型、纵欲—败伦型、失职—逃离型以及贪婪—罪恶型等几类，当然，这种分类只是相对而言，许多“父亲”兼具多种性格缺陷或恶德。

（一）严厉—冷酷型父亲

无论是“父为子纲”的伦理模式，还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严父慈母”的家教模式，传统文化都要求父亲成为理性、秩序、规范的象征，对子女导之以正。毫无疑问，无论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严父”存在。

文学作品中，对“严父”的教导之功也有正面肯定，如《歧路灯》中的娄朴就因为有严父的管教而得以远避匪类、顺利进学中举。可是，文学家更多时候看到的是理性对感性的挤压和扼杀，代表理性的父亲往往表现出专断、冷酷、暴虐等性格特点，不仅成为影响子辈身心健康成长的负面因素，而且成为子辈爱情、婚姻、自由、幸福的阻力，极端者则成为子辈生命的杀手。这类父亲形象较早见于唐传奇，《李娃传》中的荥阳公，其子留恋青楼、资财销尽、沦落为歌郎，父子意外相遇，父亲不但未施援手，反而将其毒打致死、“弃之而去”。宋元以后，这类冷酷的父亲代有传人。宋元话本小说《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周大郎、元杂剧《墙头马上》中的裴尚书、元杂剧《拜月亭》以及同一题材元末南戏《拜月亭》中的瑞兰之父、明代话本小说《醒世恒言》卷二二《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王员外、清代才子佳人小说《白圭志》中的杨时昌及《听月楼》中的柯太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父亲们为了儿子的功名或者所谓门风、礼法，别说棒打鸳鸯，甚至连子女的生命都可弃置不顾。当然，严厉——冷酷型父亲中最典型的代表应该是明代戏剧《牡丹亭》中的杜宝和清代小说《红楼梦》中的贾政。

杜宝向来以封建礼教严格约束独生女儿杜丽娘；当女儿相思成病之后，他对病因避而不谈，任其夭亡；当女儿因情复生之后，他毒打女婿柳梦梅，视女儿为妖孽，并向皇帝请旨“向金阶一打”。在确认杜丽娘是人不是鬼之后，他仍然坚持要“离异了柳梦梅”再认女儿。

贾政从儿子宝玉“抓周”那天开始，就对其存了厌嫌之心，再加上贾母的溺爱，他更是有意从严管教，平日里见着宝玉，不是“冷笑”就是“断喝”，以至于宝玉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碰见父亲，或者听说父亲传唤，就条件反射式地惊恐不安，不是“倒抽了一口气”，就是像“打了个雷的一般”，“脸上转了颜色”。宝玉对父亲，已经不是一般的敬畏，而是发展成了一种病态的恐惧。宝玉因为金钏和蒋玉菡的事，被父亲打得皮开肉绽、差点丧命，这样的遭遇对宝玉的身心无疑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二）纵欲—乱伦型父亲

这类父亲以《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和《红楼梦》中的贾珍为代表。研究者很少留心西门庆作为“父亲”的表现，尤其是他的纵欲与父亲角色的关联。其前妻留下一女西门大姐；爱妾李瓶儿生下官哥儿，很快夭折；续弦吴月娘后来生下了遗腹子孝哥儿。西门庆作为一家之主，不能“刑于寡妻”，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而娶回淫荡的潘金莲，后来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通奸，害得西门大姐自杀身亡。作为丈夫，他对李瓶儿的死悲恸不已，恨不得代替去死，可是，作为父亲，对独生子官哥儿的夭折却相当漠然，孩子刚刚“断气”，即令人“连枕席被褥抬出去”。（第五十九回）至于遗腹子孝哥儿，在西门庆纵欲身亡时呱呱落地，本来就是担负着父亲一生的罪孽转世、为赎罪而生。所以，对西门大姐、官哥儿、孝哥儿来说，西门庆都是一个重情色、轻天伦的荒淫无度的父亲。不仅如此，西门庆“梳笼”了李桂姐，又引其至家拜吴月娘为干娘，这样，西门庆与李桂姐也就有了“父女”的名分，所以，西门庆的

“纵欲”已经滑向了“乱伦”的边缘。在荒淫无耻、丧德败伦的路上走得更远的“父亲”是《红楼梦》中的贾珍，他不仅直接与儿媳秦可卿有染，而且与堂弟贾琏、儿子贾蓉一起，与尤氏姐妹鬼混，因此有“聚麀”之讥。还有《红楼梦》中的贾赦，不仅自己为老不尊、荒淫无度，还不顾父子伦常将自己“贪多嚼不烂”的丫鬟秋桐赏赐给儿子贾琏。

（三）失职—逃离型父亲

这一类父亲由于无能、懦弱、溺爱、迂腐、吝啬、自私等种种原因，不能承担起“父亲”的责任，教子无方、治家无力，极端的表现则是苦难或者灾祸当前，抛妻弃子，逃之夭夭。元杂剧《看钱奴》中的周荣祖走投无路之际将儿子周长寿卖给员外贾仁，《拍案惊奇》卷三五《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以及明传奇《看钱奴》亦演此事；《窦娥冤》中的窦天章为了筹措赶考的盘缠，将女儿端云卖给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儒林外史》中的倪霜峰做了三十七年秀才，六个儿子死了一个，卖了五个，这些穷秀才卖儿卖女，虽说有不得已之处，可是，作为父亲，毕竟他们是因为自己的无能或现实的需要，狠心地斩断了血缘亲情。《警世恒言》卷一七《张孝基陈留认舅》中的过善、《拍案惊奇》卷一三《赵六老舔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泉成铁案》中的赵六老、《型世言》卷一五《灵台山老仆守义 合溪县败子回头》中的沈闾等等则都是溺爱不明的父亲，导致他们的儿子不是败子就是逆子。《姑妄言》中的竹清、《醒世姻缘传》中的晁思孝等不止为父溺爱不明，而且为人刻薄寡恩，或者为官贪苛昏庸。《红楼梦》中的贾敬，干脆放弃了父亲的责任，一心只想着自己修炼做神仙，对家事子女不管不问。这些“父亲”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都未能很好地恪守父职、履行父责。

更有甚者，有些父亲在面临困境时，置妻儿于不顾，出逃了事。在“二十四孝”中有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乃宋代真人真

事。此后，元明清三代，无论正史还是稗官小说，“寻亲”（寻父或者寻母）故事不绝^①。作者或者读者、研究者大多注意到了“寻亲”母题所蕴涵的“孝”的文化内涵，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类故事中，“亲”不在、需要寻找的原因之一是父亲临难出逃。

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清之际被广泛传诵的王原寻父亲王珣的故事。这个故事见于李贽《续藏书》卷二四“孝义名臣”、《文安县志》、《国朝献征录》卷一一二、何乔远《名山藏》卷九八、《明史》卷二九七本传等；文学作品则见于江盈科《雪涛阁集》卷二《王孝子》诗、周清源《西湖二集》卷三一《忠孝萃一门》“人话”、天然痴叟编《石点头》卷三《王本立天涯求父》、陆人龙《型世言》卷九《避豪恶懦夫远窜 感梦兆孝子逢父》、《清诗铎》卷一〇缪沅《王孝子诗》等等。据李贽的记载，王珣离家的原因是“贫甚，苦于里役”，当儿子王原找到他时，珣说：“委妻子二十年，何颜复见汝母乎？”对此，小说多有铺陈。《王本立天涯求父》中写到，王珣为了“身上轻松、眼前干净”，抛下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绝情而去，而且一路上游山玩水、心胸开爽、目旷神怡、心中喜悦，不以妻、子、故乡为念。儿子长到十六岁，即抛母弃妻，走上寻父之路，漂泊十二年、历尽艰辛，才找到王珣。《避豪恶懦夫远窜 感梦兆孝子逢父》将王珣的名字改成了王喜，并且增加了王喜与“里蠹”崔科发生争斗、担心被对方加害的情节，出逃的理由似乎充分了一些。与王珣“出逃”相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些，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八载艾子诚寻父事，艾父也是与人打斗，误以为对方死亡，畏罪而逃。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〇载赵重华万里寻亲事，赵父喜欢旅游，周游天下，不思家乡。赵重华成年之后，立志“从今即与家人诀，不睹亲颜誓不还”，结果在一寺庙里找到了父亲。《儒林外史》中郭孝子寻亲的故事更耐人寻味。王惠为人鄙薄，为

^① 刘勇强：《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以“水贼占妻（女）型”与“万里寻亲型”为中心》，《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官贪酷，并投降宁王做了伪官，兵败之后隐姓埋名削发为僧，他的儿子“郭孝子”二十年走遍天下寻父，最后侍奉他归老之后带骸骨还乡。这些寻亲故事中的“父亲”，享受到了儿子超乎寻常的孝道，却没有尽到父亲应尽的责任，有的甚至是小人或者恶人。

（四）贪婪—犯罪型父亲

明清小说中贪婪、狠酷乃至犯罪的父亲非常多见。具代表性的贪婪—犯罪型父亲常见于两类故事之中：一类是父（母）亲薄情寡义、恩将仇报、悔亲寒盟，将儿女逼上绝路。《娱目醒心编》卷一二《骤荣华顿忘夙誓 变异类始悔前非》中的胡君宠，《炎凉岸》中的冯国士都是这类父亲。另一类是受害者转世投胎为凶手之子以报前仇，这类故事中的“父亲”贪婪凶残，乃至谋财害命、违法犯罪。《雅观楼》中的“钱是命”夫妇贪西商十万余金，致其气绝身亡。西商转世投胎为其子钱观保，将钱家所有家产败光。《百家公案》第六十三回《判僧行明前世冤》中的程永，杀幼僧江龙，取其钱财致富。江龙投胎为其子程惜，时有杀父的冲动，后来包公梦中得知为二十年前冤仇，审明谋杀案惩处了程永。最触目惊心的是《欢喜冤家》第二回《吴千里两世偕佳丽》中的故事，江西新城人陈栋杀死从战场上得胜返家的吴胜，得黄金千两而骤富。三年之后，陈栋邂逅邻村一个三岁小孩，见面就笑嘻嘻叫陈为“爹”，栋于是将其过继为子，取名陈三元。一年多之后，陈栋在酣睡之中，三元拿着一把小刀在他的肚腹上玩耍，陈栋睡梦中以为是蚊虫之类，一手拍去，气绝身亡，原来三元乃吴胜转世。就这样，一个四岁的幼儿，终于在戏耍中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颇具象征意义的“弑父”之举。

二 “审父”意识

所谓“审父”意识，一般指对父亲形象以及它所代表的父权制

文化的审视和批判，属于否定性概念。本文参考有关论者的说法，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审父”之“审”不单是“审判”，还包含了“审度”、“审视”、“审察”以及“观照”、“思考”等等多种义项，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弹性与张力的概念，其正面一端可以延伸出“思父”、“寻父”、“敬父”、“崇父”、“颂父”等概念，其负面一端则可以延伸出“丑父”、“诋父”、“渎父”、“叛父”乃至“弑父”等概念^①。因此，本文所说的“审父”意识之“审”，根据具体语境，有时指“审判”、“批判”；有时指“审视”、“思考”等，在后者则包含了正负两端的各种义项。

创作主体通过对“父亲”形象的现实观照或诗意想象，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都是对先验性父权制文明的一种哲理性的沉思和追问，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形式的“审父”叙事都具有修辞性的隐喻或者象征意义。在此理论前提下，结合上述四类负面父亲形象为代表的父性叙事对中国传统文学中蕴涵的“审父”意识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在讨论中将“审父”主体区分为三类：当事者——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包括父辈和子辈和其他相关人物；叙事者——创作主体；接受者——“我们”，即笔者所代表的现代读者。为了明晰起见，下面仍然按照上述四种分类进行分析。

在严厉—冷酷型父亲的叙事文本中，面对父亲的权威，子辈主观上是认同的，所以，尽力表现出尊敬和服从。当他们因为感性欲求的需要，尤其是因为强烈的爱情冲动，客观上与父亲的权威发生冲突时，他们只能被动挨打，比如荥阳生；或者消极逃避，比如宝玉、谭绍闻；或者在合乎理性秩序的范围内进行柔性的反抗，比如杜丽娘与柳梦梅。荥阳生、宝玉等对传统父子伦理是完全认同的，他们虽然行为上违背了父亲的意愿，观念上则对父亲保持礼法所要

^① 杨建建：《以“父亲”的名义：论西方文学中的审父母题》，《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求的尊崇、敬畏；相比之下，杜丽娘、柳梦梅等虽然没有与父亲决裂，而是借助更高的权威——圣旨勉强达成了和解，可是，柳梦梅所说的“好狠心的父亲”、“五雷般严父”、“十地阎君”之类的怨言，却初步具有了“渎父”的意识。就创作主体而言，虽然对“父亲”的权威并没有明确的批判性话语，相反，还有意突出了荣阳公、杜宝、贾政等人物的正面身份和品格，以强调父亲权威的合法性，但是，客观上却通过这些父亲对子辈身心造成的伤害，让读者看到了“父亲”以及“父亲”所代表的理性法则的冷酷无情。因此，我们说，这些父亲形象，客观上展示出了父权制文明的某些负面性特征，从而具有了反思和启发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与顽固不化的杜宝以及简单粗暴、动不动就要子辈性命的周大郎们比较，作为父辈，当事者贾政其实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自审意识，他曾经对贾母说：“老太太当初疼儿子这么疼的，难道做儿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儿子不成么！只为宝玉不上进，所以时常恨他，也不过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红楼梦》第九十六回）叙述者亦曾明确指出贾政命宝玉叔侄作《婉孌词》之前的心理活动：“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无论贾政自己对贾母的表白，还是叙述者对他心理活动的透视，都说明这位父亲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理性与感情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在观念上和行动上都对代表理性的父道之“严”产生了动摇，具体表现就是对宝玉不再以举业相逼，转而欣赏、肯定其诗词方面的“歪才”。贾政这一不起眼的“让步”，隐含的意义却非常深远：早在十八世纪末叶，曹雪芹不仅像汤显祖等先行者一样，客观展现了传统父亲形象的负面特征，而且通过贾政这一形象，站在父辈的立场，对父权制文明进行了“自审”。虽然程度有限，但是，仅此一小步，足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红楼梦》的超越性价值。